

欧阳发丁 剑 编著

新编方志十二编

黄山书社

新编方志十二讲

欧阳发 丁 剑 编著

黄 山 书 社

一九八六年·合肥

1101597

责任编辑：沙宗复

装帧设计：方绍武

封面题字：董一博

新编方志十二讲

欧阳发 丁 剑 编著

*

黄 山 书 社 出 版

(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25 字数：130,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7,000

统一书号：11379·16 定价：1.10元

编 者 的 话

近几年来，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们撰写了若干篇关于新方志编纂方面的专题讲义，讲授于省内外修志人员培训班，但较为粗略、不系统。为了适应新志编纂的需要，在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支持下，我们把原来的讲义删补修改，汇集成书，供本省各地修志学习和参考，同时与外省进行交流，广泛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今由黄山书社正式出版。

新志编纂是个新课题。由于笔者雏犊学犁，知识浅薄，研讨不深，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加之分头撰写，论点岐异、内容重复、文风不一等缺点亦较明显。我们真诚地期待着同志们的批评与指正。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吸收了国内方志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得到了全国许多修志单位领导和同志的指点与帮助，特别是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不耻下交，为本书题签；本书编写和修改过程中，曾得到傅振伦、黄苇、仓修良等专家、教授的热情鼓励，均在此表示谢意！

一九八六年元月二十日于合肥

目 录

第一讲 中国方志概述

- (一)方志的起源..... 1
- (二)方志的发展..... 3
- (三)安徽方志沿革..... 15

第二讲 方志的类别、性质

- (一)方志的类别..... 18
- (二)方志的性质..... 22

第三讲 新编方志的意义

- (一)新编地方志可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27
- (二)新编地方志可以起到存史的作用..... 31

第四讲 方志的体例、篇目

- (一)何谓体例..... 33
- (二)方志体例的发展和类型..... 35
- (三)方志体例的继承与创新..... 42
- (四)新方志篇目设计..... 46
- (五)拟定篇目中的若干问题..... 53

第五讲 如何征集资料

- (一)征集资料的范围..... 56

(二)资料来源和征集办法·····	58
(三)如何整理、鉴别资料·····	63

第六讲 如何编写概述编

(一)概述编的名称·····	70
(二)概述编的意义·····	72
(三)概述编的内容·····	74
(四)概述编的文体·····	77

第七讲 如何编写大事记

(一)大事记的演进·····	79
(二)大事记的内容·····	80
(三)大事记的体例·····	82
(四)大事记中如何记述政治运动·····	85
(五)编写大事记的要求·····	87
(六)大事记编写中的若干问题·····	89

第八讲 如何编写专志

(一)专志编写的基本原则·····	92
(二)各类专志编写的具体提示·····	98
(三)专志编写中的若干问题·····	111

第九讲 如何编写人物志

(一)人物立传的范围和标准·····	113
(二)方志传记的体式和要求·····	119
(三)人物志编写中的若干问题·····	123

第十讲 图、表

关于图·····	128
关于表·····	137

第十一讲 序、跋、凡例、附录及其它

(一)关于序、跋·····	145
(二)关于凡例·····	149
(三)关于杂志(记)、附录·····	152
附:《万年县志·序》、《呼玛县志·序言》	

第十二讲 新志编纂中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方志成书的方法问题·····	160
(二)关于遵守疆界和断限的问题·····	161
(三)关于引进新的学科成果的问题·····	164
(四)关于“志书类辞书”的问题·····	165
(五)关于执简驭繁的问题·····	167
(六)关于志书的保密问题·····	169
(七)关于审稿标准问题·····	170
(八)关于地区简志问题·····	173
(九)关于志书文体问题·····	175

附录

关于合志·····	181
关于山志·····	188

第一讲 中国方志概述

(一)方志的起源

关于方志的起源，历代史志学者的说法是不大一致的。

有的认为方志起源于史。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从“志为史体”角度出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记载地方史事的书籍，如晋之《乘》、楚之《杻杙》、鲁之《春秋》等，应是最早的方志，因此有所谓“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之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些史书，类似后来的地方志，具有地方志的雏形，应称为方志之源。如果是这样的话，方志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惜这些史书已失传，无从考察其体例和内容。

有的认为方志脱胎于地理，即所谓方志导源于《禹贡》、《山海经》之说。认为方志是从舆地学科(地理书)演变而来的。《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作者不详，著作时代无定论，近代多数学者认为约在战国时。这部书用自然分区方法，记述当时我国的地理情况，把全国分为九州，假托为夏禹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详细记载了当时黄河流域的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长江、淮河等流域也有记载，但较为粗略，是我国最早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地理著作。《山海经》，共有十八篇，是由《山经》、《海经》、《大荒经》等三部分组成，作者不详，各篇著作时代

亦无定论，近代学者多数认为不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其中十四篇是战国时作品，《海经》内四篇则为西汉初年作品。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事实上，从体裁到内容，这两部地理书对方志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致使宋代以前的地方志，多与地理书混杂相兼。

有的认为方志不仅导源于《山海经》和《禹贡》，而且同《周官》也有渊源关系。周官指周朝王室的官制，后成书《周礼》，亦称《周官》。宋代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认为，周官中的职方、土训、诵训的职掌，与后世方志都不无相似之处。

还有的认为《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为方志的鼻祖。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从这几本书的体例和内容更近似方志而言的。因此，清代方志学家洪亮吉在《澄城县志》序中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越绝书》十五卷，为东汉袁康所撰，记述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地方（今浙江和江苏一部分地区）的历史沿革、城市建设、山川、人物、生产情况和风俗习惯等内容，与后世方志的体例、内容相近。《吴越春秋》全书十五卷，为东汉赵焯撰，记吴越二国兴亡始末，今存十卷，前五卷叙吴，起自太伯，迄于夫差，后五卷记越，始于无余，终于勾践。是书只记人物，不载地理及都邑，就方志而论，虽比不上《越绝书》充实和周备，但对后世影响也很大。为此，范文澜认为“东汉会稽郡人赵焯著《吴越春秋》，又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掌故，开方志的先例。”（《中国通史简编》）《华阳国志》，晋常璩撰，全书十二卷，附录一卷，记述以巴蜀为

中心的西南地区的地理沿革和历史变迁，对于政治、历史人物等方面的记载尤为详尽，也有些学者认为它是方志的前身。

对此，谭其骧教授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史”与“志”不同，东汉的《越绝书》、《吴越春秋》以及《华阳国志》与隋唐以后的地方志不同，是地方史。

以上几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现在有些地方志专家、学者认为，方志并非起自一源，而是多源。我国地方志，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从各方面吸取源泉而逐步发展演化而来的。

(二)方志的发展

方志的发展，一般来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秦代以前偏重于历史，汉唐时期偏重于舆地，自宋以后则是史志合一，谓之“史志体”。如果从“史志体”的方志而言，它孕育于汉晋，成型于两宋，发展于元明，隆盛于清代，民国又有新的变化。

1.从秦汉到隋唐以前的方志

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推行郡县制度，实行中央集权，各国的史书遭禁毁，修史之权收归中央。因为统一国家的出现，封建统治阶级又需要了解郡国的情况，做到胸有全局，于是要求地方将舆地详情上报，这就为方志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所以，确切地说，秦汉以前的方志，不过是“一国之史”而已。方志的产生也是社会经济

文化发展到一定时候的产物。

随着生产的发展，汉魏六朝时期，私修史志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时期内，地方志有三类著述：第一类，地理志（主风土）。多记一方疆界、区域、山川、道里、户口、民情、风俗等。其中以汉代朱干的《地理书》、后汉应劭《十三州记》、晋挚虞《畿服经》、陈顾野王《舆地志》、北魏阚骃《十三州志》等较有名。可惜这些皆已失传。第二类，郡书（主人物）。多记郡国乡邦先贤、耆旧节行，用以叙功劝善，传之久远。著名的有《三辅耆旧传》、《鲁国先贤传》、《京兆耆旧传》、《会稽贡举簿》、《陈留耆旧传》、《汉中耆旧传》、《雍州学官志》、《兖州山阴先贤传》等，这些实为一方之人物志。第三类，都邑志。多载城池、郭邑、宫阙、花囿、观阁、仓廩、陵庙、行廛等，辨其规模，明其制度。如《三辅黄图》、《长安图》、《西京黄图》、《关辅古语》、《三辅宫殿名》等。

上述三类著述，各以其所载内容和所取形式开创了后世方志的一个重要方面，及至《越绝书》出，内容兼记人物、地理和都邑等门类，体例亦趋完善，已初具了方志的规模。

魏晋时期的各类志书，大都早已亡佚，传世者屈指可数。其中保存最完整，史料价值最高的是《华阳国志》。这部书兼记地理、历史、人物，特别对于政治历史人物的记载尤为详尽。例如陈寿《三国志》记诸葛亮南征不到三十个字（“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裴松之作注也不详，而《华阳国志》有七百多字的记载，包括进军路线、战争情节、善后措施等方面都有记述。又如李冰修都江堰，《史记》、《汉

书》记载都很简略，但在《华阳国志》记载就较为丰富。《华阳国志》的作者很重视口头资料的收集，其中还记载了一个“石牛便金”的故事，十分有趣。总之，《华阳国志》取材广泛，内容繁富，所以吕大防称赞这本书“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华阳国志序》）

除《越绝书》、《华阳国志》外，这一期间还有后汉赵炳的《吴越春秋》、三国吴韦昭的《三吴郡国志》、三国吴顾启期的《娄地记》等方志代表作。

2. 隋唐时期的方志

隋唐时期，中国已成为当时世界上以繁荣富强和高度文明著称的国家。这期间，方志由私撰一变而成为官修。官修志书的好处是在短时间内，集中足够的人力和资料，由史馆（后世为志局）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组织，分工合作，一般成书较快。官修制度促进了方志的发展。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隋大业中（605—617年）普诏天下诸郡，采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三十一卷，《区宇图记》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这些地理总志卷帙之众多和内容之繁富，为前代志书所莫及，也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纂修这一类志书创立了格局，奠定了基础。

到了唐代，纂修图经制度比隋朝更加严密，由皇帝下诏，全国各州府每三年（一度改为五年）一造图经，送尚书省兵部职方。于是不仅有当朝的史官、名臣亲自撰写方志，而且各郡府也相继写出一大批反映地方地理、政治、人物等方面的概况的地方志，不仅取材较前广泛，而且在详略适中、记叙有

法、内容真实等方面，也远非前志能比。

唐代纂修的第一部地理总志是《括地志》，五百五十卷，领修者李泰是唐太宗的第四子，从贞观十二年(638年)撰修到贞观十六年(642年)成书，历时五年。全面记载了各地的建置沿革、山川形胜、河流沟渠、风俗物产、往古遗迹以及人物故实等等。李世民赞许说：“博采方志，得于旧闻，旁求故老，考于传信，内殚九服，外极八方，简而能周，博而尤要，度越前载，垂之不朽。”(《玉海》卷十五)但《括地志》有个严重缺陷，有志无图，内容不能算是完备。德宗贞元年间，鸿胪卿贾耽撰《海内华夷图》和《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二书，有图有说，图说并行，并以图闻名于世。

唐代全国性总志的代表作是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全书四十卷，以唐制分别记述各府州县户口、沿革、山川、道里、贡赋等项，卷首并附图，南宋时图已亡佚，书名也从此略称《元和郡县志》。由于作者是两任宰相，精于地理，熟悉各方面情况，因此，所著“详略得中，记叙有法”。这部书不仅是魏晋以来保留下来的最古一部总志，也是较好的一部。

唐代方志的主要形式是图经。当时所修的图经已经遍及全国，连边远州县也不例外。敦煌发现的唐人图经就有《沙州图经》、《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图经》等。其中《沙州图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经，修于开元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从今天残存的部分看，文字简洁，叙事明爽，除记载当地行政机构和区划外，对于那里的天象、蓄水、渠、泽、堰、堤、驿、县学、社稷坛、杂神、寺庙、冢、古城、祥瑞、歌谣、古迹等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述。从体例上看，分

门别类，有图有说，综合记录，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方志体例。

这一时期的方志，有着明显的趋势：一是记述州县的方志，虽然还多以图经、图记、地记为名号，但已开始称之为“图志”或“志”；并且“经”和“志”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图的地位和作用明显缩小。二是这时的志书，为了加强封建中央政权的统治，对人民的财富进行进一步的搜刮，增加了四方贡赋、建置沿革、因时制度、事迹人俗等门类，由过去单纯记载地理方面的志书，开始地理、政事并重。这些在方志发展史上都是一个大的进步。

3. 两宋时期的方志

经过五代十国的长期动乱，国家典籍沦亡殆尽，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北宋政权建立后，对包括地方志在内的文化典籍的征集和编纂特别重视。它承袭了唐代三年一造图经的制度，规定“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县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宋史·职官志》）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朝廷还设置专门的中央修志机构“九域图志局”。

宋代的地方经济，比之前代更为发达，客观上需要有一种综合性的记录。因此，宋志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上继《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而兴全国性的区域志，一是总汇地记、图经而创州、郡志。

宋代方志在我国方志史上地位是很重要的。一是数量众多。据统计，宋志总数近六百种，大大超过了以前历代方志的总和，几乎“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记录焉。”（《仙

溪志序》)二是从体例到内容更为完备,具有首创精神。汉、唐方志多数详于地理而略于人文,或专记某一方面,应该说是太不完备的方志。到北宋时的方志,如乐史撰《太平寰宇记》,于地理之外,增加了姓氏、人物、风俗数门,在人物中又增加了官爵、诗词艺文等内容,使方志的体例大变。这一重要突破,使方志由輿地之书迈向了史学领域,极大地提高了地方志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三是从名称上,由称图经、图志改称为志。例如,《严州图经》在绍兴年间的刻本改称《新定志》。严格地说,地方志发展到南宋才算定型下来。

这时期著名的志书有:乐史《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太平兴国时基本完成。作者杂取山经地志,纂成此书,始于东京,终于“四夷”,为后来总志体例的沿据。后人评论这部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并说方志“记载自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四库全书总目》)因此,是书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王存《元丰九域志》,十卷,元丰三年(1080年)成书,八年(1085年)颁布。体例因袭唐《十道图》、宋《九域图》等图经,而取消其地图部分。以熙宁、元丰间四京、二十三路为标准,分路记载府、州、军、监、县之户口、乡镇、山泽、道里等项。对各地区间四至八到,叙述最详,州县土贡,又备载额数,足资考核。

王象之《輿地纪胜》,原书二百卷,仅存四卷,成书在嘉定、宝庆间。这部书是采用述地记人两汇合的体例的典型。王象之自序说:是书“以郡之因革,见之编首,而诸邑次之,郡之风俗又次之,其他如山川之英华,人物之传说,与夫诗章文翰之关于风土者,皆附见焉”。对后代有一定的影响。

宋敏求《长安志》，二十卷。为考订长安古迹的专书。详于记载长安城郭、宫殿、坊市等。是我国古代有关长安地志的重要著作。

《临安三志》。临安有志始于祥符，但已久失不传。宋南渡后建都临安，乾道三年(1167年)，府尹周淙始为之志，即所谓《乾道志》，现存南宋方志，当以此为最古。其后施谔于淳熙十二年(1252年)重事增辑，成若干卷，称为《淳熙志》。潜说友继之又为《咸淳志》，书成于咸淳四年(1268年)。三者各有所长，为世所重，称为《临安三志》。这三本志书，都体现了宋志叙事详明、体例简洁的优点，其中又以施谔《淳熙志》为最著名。

此外，还有罗愿的《新安志》(徽州志)、梁克家的《三山志》(福州志)、陈耆卿的《赤城志》(台州志)、杨潜的《云间志》(松江志)、范成大的《吴郡志》、施武子的《会稽志》等都有一定的名气。但朱彝尊批评说：“每患其太简。”(《四库全书总目》)从这些志的名称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宋志的一个特点，即州县志书往往不直标某州县志，而动援古郡或山水以为名。

总的说来，宋修方志从时代来看，南宋多于北宋；从地方来看，南方多于北方。宋代方志流传下来的不多，现存宋志大约不超过三十种，但无论是探讨方志的源流，还是研究宋代历史，都有它重要的参考价值。

4. 元明时期的方志

元代属于少数民族统治，但方志传统并未中断。元统一中原以后，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封建帝国，“北逾阴山，西极

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集贤大学士扎马拉鼎奏称：“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为书以明一统。”世祖采纳了这个建议，遂命扎马拉鼎、卢应龙等以职方所上版图，纂辑为志，二十八年（1291年）书成，凡七百五十五卷。后增为一千三百卷，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

《大元大一统志》以各路和行政省直辖的府、州为纲，分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胜、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门，内容详富，为明清官修总志的蓝本。这部志书无论从史志价值和学术上都有一定地位，可以说元代志书的最大成就是修纂了这部《大元大一统志》。

元代纂修的州县志数量不多，见于著录的大约不超过一百六十种，保存下来的仅有十一种，其中也有一些佳作，颇有特色。例如，至元年间的《嘉禾志》，详考金石文字。至正年间的《金陵新志》，条理井然。大德年间的《昌国州图志》，有条不紊。以及于钦的《齐乘》和李好文的《长安志图》均相当著名。

明代修志的成就很大。据《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明代地方志为七百七十种，一万零八十七卷。这个时期方志发展的特点：一是官方对修志特别重视。开国之初就着手纂修方志，洪武三年（1370年）下诏编纂《大明志书》，为了划一规格体例，永乐年间曾两次颁降修志条例，确定志书内容应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城郭、镇市、土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里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二十一类。这